

临汾文史资料

第二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
临汾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选编

目 录

· 临 汾 风 云 ·

- 振奋人心的临汾学生运动……………张俊华 文平整理 (1)
回忆抗战前夕临汾的一次学生运动……………朱 鸣 (9)
抗日战争时期临汾河东政治形势概述……………赵世元 (13)

· 革 命 回 忆 录 ·

- 一件记忆犹新的往事……………王茂发口述 文平整理 (30)
峥嵘岁月
——记西北人民军政大学在临汾……………孙 戈 (36)
战斗剧社在临汾的回忆……………侯锦如 (51)
抗日时期的小程村……………张耀庭口述 梁正岗整理 (59)
忆田振芳战友和“我的追悼会”
……………王铭三口述 李逢泽整理 (63)
忆湘南老师……………乔仰恒 (66)
一位纨绔子弟的执着追求……………孔祥智 文平 (69)
“景疯子”抗日故事二则……………孔祥智 文平整理 (92)

• 诗 词 选 录 •

- 临汾即景.....段 云(98)
鼓楼重辉抒怀.....张克昌(99)

• 古 今 逸 闻 •

- 漫话平阳.....石青柏(100)
漫话平阳铁佛寺.....朱 鸣(104)
龙子祠的传说.....吕九成(110)
龙子祠泉小考.....仇克询(111)
临汾古塔与地震.....仇克询(113)
牛王庙会.....英巧 正平(115)
古代两位临汾的爱国将领.....张同廷(117)
卫、霍之墓在咸阳.....侯文海(122)
临汾五一剧团史话.....梁正岗 文平(124)
梁培璜点滴.....梁正岗(139)
临汾篆刻名人李学曾和他的近作.....文 平(140)
梁培璜史料征稿启事.....文史委员会(141)

振奋人心的临汾学生运动

张俊华 文平整理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义愤填胸，怒不可遏，抗日浪潮如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大革命失败后，一度平静的临汾古城，此刻也沸腾了起来。

当时，临汾城内有“山西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山西省立第六女子师范学校”，“山西省立第六中学”。这些学校里聚集着来自临汾及邻近各县许多进步青年。他们爱国心切，虽稚气犹存，却血气方刚。邓晨曦、刘舒侠、高文凯、王洪旭、何培俊、朱剑白、解兆元、苏玉涵、李希林、赵源等，即是这批青年的代表和佼佼者。在他们的带动和影响下，以学生为主体的抗日救亡活动，搞得轰轰烈烈，在临汾的抗日史上占有相当位置。

临汾的学生运动，较早的是一九二八年冬由六师进步学生李贡选（李唯一）、张溶（张静波）、侯少华、袁守信、李俊秀等发起和领导的驱赶校长梁登泰的那次。梁于“四、一二”后出任六师校长，系临汾县党部执行委员，思想很反动，他一上任，首先着手清理大革命时期的积极分子，接着便在学校建立国民党的组织（每个班、级都设支部），开设三民主义课，禁止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并加强训导工作，大量吸收国民党员到六师任教。

这次学潮未成功，梁登泰的校长“宝座”不仅未动，李贡选、张溶、侯少华、袁守信、李俊秀等受到开除处分，被逐出校。这次学潮从精神上、思想上给了梁登泰以沉重的打击。李贡选、张溶、侯少华、袁守信、李俊秀等离开六师后相继到太原求

学。后来，李贡选、张洛和继投入革命，为党为人民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侯少华思想颓废，不积极革命，当巡官混饭吃；袁守信、李俊秀背离人民，干起了反革命勾当，全国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处决。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以宣传抗日为主的临汾学生运动再度掀起。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日军气焰嚣张，步步紧逼，大有吞噬中华之势，蒋介石扯起“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帜，只剿共不抗日，亡国之灾近在眉睫，中华男儿，热血青年，怎能不心急如焚呢？

临汾的天下和全国一样，毕竟是国民党的天下，临汾县党部说的、作的全是蒋介石的一套，指望它亮出抗日救亡的旗帜，根本不可能。在这里，有抗日要求和行动的人，都会遭到意想不到的处置，抗日救亡是要担风险的呀！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临汾的青年学生终于起来了。这一年的年末，临汾城里各中等学校提前放了假，六师的张德领（张简古）利用这个机会，邀刘舒侠等倡议组织“临汾各界抗日会”。

张德领，浮山人，临汾大革命时期的党员之一，“四、一二”清党时，被捕入狱，一九三零年获释，三一年下半年入六师插班学习，与刘舒侠同班，关系密切，刘舒侠同志慷慨应允并热情而积极地参与了这一组织的发起和组建工作。

张德领在刘舒侠等的配合协助下，辛苦奔波，先后联系了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刘临科、王权五以及和党组织靠近的李跃庚等。不久，徐亚桑的女儿徐立民，六女师的贾玉兰也相继加入了战斗行列。从太原回到临汾的一批学生也参加进来了。就这样以学生为主体，有商人、进步士绅参加的“临汾各界抗日会”成立了。

“抗日会”成立后，狠抓了宣传工作和发动群众，并注意了查日货，一经查出，当即烧毁，工作搞得很有起色。特别是临汾

商会的会长（李文华，外号李麻子、骑氏人）劲头大，热情高，他到处讲演，富有鼓动性和号召力。县立第一高小校长李金命也参加了“抗日会”活动，积极性很高，产生的影响也很大。

县党部对学生的抗日活动，憋着一股子气，恨不能把“抗日会”荡平粉碎，学生们则一心想占据县党部。一天，在李跃庚带领下，潮水般涌向县党部，一举将其门前的大牌子捣了个粉碎，换上了“抗日会”的牌子，县党部的人暴跳如雷，摆出气势汹汹的架式，声嘶力竭的狂叫：这还了得，简直没了王法……。

抗日救亡活动从此便在县党部开展起来了。以后由商人搞了些募捐，为开展活动提供了资金。当时的斗争，党的领导不明显，几乎纯属青年学生的自发行动，但斗争劲头猛，声势大，影响深，尽管县党部不允许，不承认，百般阻止，但也奈何不得。

接着，临汾六女师发生了驱赶校长李茂堂的学潮。领导这次学潮的学生领袖是徐福静、王瑞华（又名王磊）、李福贞。她们都是临汾六女师地下党组织新吸收入党的先进青年。徐福静起草、刻印宣传材料，王瑞华进行讲演，李福贞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在她们的发动和组织下，在大操场举行了驱赶校长李茂堂的集会。这次学潮虽搞得比较温和，但在临汾却引起了很大震动。

李茂堂身为校长，不抓校政，不问教学，成天睡觉，抽大烟，省财政拨款的校舍修建款，他截留下来修建了私人住宅楼，……学潮中，这些丑闻一一被揭露出来，李茂堂尊颜全失。在学生运动缓和下来后，他恼羞成怒，作出了开除“闹事”学生的决定，并挂出牌子。其中有王茹馨、李福贞等。意外的是竟没有王瑞华、徐福静这几个委员。为了把开除的学生留下来，徐福静、王瑞华又发动和领导了罢课，迫使李茂堂收回成命，恢复了这几个学生的学籍。时隔一两个月，六女师的第二次学潮又发生了。组织者、领导者依然是徐福静、王瑞华。一天晚上，李茂堂正在抽大烟，徐福静、王瑞华带领同学们拿着哑铃和球杆，劈哩啪

啦、冲向李茂堂的办公室，并迅速将其包围。李茂堂见势不对，只好狼狈而逃。他一口气跑到火车站，乘车去了太原。斗争取得了胜利。

一九三二年，又一个新的年头开始了。临汾城内中等学校“同学会”在高文凯、邓晨曦、刘舒侠等的发起下成立了，六中的高维昆当选为“同学会”执行委员会主席，邓晨曦、刘舒侠为执行委员，在城内的“教育会”机关举行了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作出了几条决议，其中有一条即筹建临汾县图书馆和体育场。这条决议的提出是有来头的，会议之前，邓晨曦、刘舒侠从王达三、乔响恒（乔宗家）那儿得到一条可靠消息：临汾伪县长刘玉畿为讨好上司，欲从地方公款中，拿出五千元现大洋，奉送给省民政厅厅长马骏（字骏图）去开办“重石中学”。五千元大洋，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可观的巨款。按说，临汾人民的钱，理所当然的应用在临汾人民身上，可刘玉畿不这样作，而是要拿上临汾人民的钱去为他个人升迁作“进见礼”，多肮脏的灵魂，多卑劣的手段啊！临汾人民怎能容忍他这样作呢？于是“同学会”代表临汾人民的意志作出了截留这笔款，筹建图书馆、体育场的决议。

决议作出后，邓晨曦、刘舒侠受“同学会”的委托，多次找刘玉畿交涉，刘每次都是以财政上“没钱”予以搪塞，而且不允许他们多说。后来，邓晨曦、刘舒侠走访了一些教师：六师的亢俊吉（亢登峰），六女师的乔响恒，财政局长王达三（曾任过邓晨曦、刘舒侠的老师）等，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决定动员社会力量进行斗争。

邓晨曦家庭贫寒，是个半工半读生，他除求学念书外，在学校还担负刻腊版当录事的工作。一九三零年，学校换了新校长史宪庆，邓晨曦的录事也被免去。邓晨曦求学有了困难，就到教育会去找他高小时的班主任老师教育会总干事李金命，李安排他当

了教育会的录事，继续刻腊版，每月可领四元钱的津贴。

邓晨曦、刘舒侠等利用邓晨曦系教育会成员这一有利条件。在取得李金命同意后，就以教育会的名义召开了全县中、小学代表参加的教育会议，共计二百来人，会议期间，邓晨曦、刘舒侠又以教育会的名义，请刘玉畿去讲话，刘玉畿无法推诿，只好答应。

这次会议，名义上是教育会议，实际上是要追究那五千元大洋，为建图书馆，体育场落实款项，邓晨曦、刘舒侠等就五千元大洋一事，向刘玉畿提出质问，刘玉畿矢口否认，学生们提出要查帐，老奸巨滑的刘玉畿不得不答应。

查帐小组成立起来了，朱剑白等四五人，查得认真细致，刘玉畿慑于学生的压力，在无可奈何之下，承认了此事，五千元大洋依然留在临汾人民手中，斗争取得了胜利。

为了用好这笔钱，学生们组织了图书馆筹备小组，邓晨曦、刘舒侠等均为成员，时间不长，图书馆就在老谷庙（现地区大礼堂）兴建起来了。先在门口盖起了两间房子，一间住管理员，一间住工友，又购置了图书、家具，修葺了两廊阅览室，教育会选派李梅五（后为赵英）经管图书馆。李梅五是个热心肯干的人，除管好图书外，还注意环境的改造，夏天在院里栽种大荔花，秋天养菊花，曾肥“菊展”争取到这儿来搞。

一九三三年冬天，临汾六师发生了驱赶校长史宪庆的学潮。史宪庆于三零年初接替梁登泰出任六师校长，在反共这一点上与梁完全一致。史宪庆为了维护学校秩序，缓和矛盾，把学生引向闭门读书的轨道。他想方设法请了一批好教员，除允许学生上课、听课，服从夫子们忠诚党国的一类说教外，再无其它自由可言。学校冷冷清清，空气窒息。为了改变这种闭门读书的状况，打开参加社会活动的局面，于是发生了驱赶史宪庆的学潮。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学生高文凯思想进步，与刘舒侠同住

一个宿舍，两人很要好，无话不说，亲如一人。他俩秘密串联了一些同学，队伍象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大，其中的骨干有王洪旭、解兆元、郝培俊、朱剑白、苏玉涵、赵源等。

一天下午，高文凯约刘舒侠等在城东南的桑园开会，具体研究和部署这场斗争。预定的时间一到，急促的钟声在校园响起，大部分人不知怎么一回事，糊里糊涂的跟上跑。在一块平坦地里，高文凯慷慨激昂地讲了几句话，一下拨亮了同学们心中的灯。郝培俊起草宣言，发了通电，紧接着便涌向史宪庆的办公室，宣布了史的八条罪状，立即将他轰走。史被赶走后，高文凯、刘舒侠、邓晨曦等在学校组织了纠查队，以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同时对图书室、资料室、仪器室、会计室等要害处室加强了管理。由于准备充分，组织周密，这场斗争十分顺利地取得了胜利。

为取得社会的赞同和支持，史宪庆被逐后，王洪旭骑自行车到太原找李贡选进行联系。当时，太原成立有六市学潮后援会，后援会发宣言，表示支持临汾的学生斗争，同时还将王洪旭带到太原的传单广为散发。这就使临汾的学生斗争得以深入发展和迅速扩大。死水一潭的临汾六师变成了开水锅，史宪庆精心设计和维持的一套秩序被打乱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县公安局插手了。

一天，学校里来了一个姓胡的巡官，声称要调解此事，要学生派代表去公安局。学生们十分清楚，这决不是要调解，而是准备镇压，去还是不去！不去，表现了懦弱，没骨头；去，凶多吉少。最后，还是决定要去。邓晨曦、刘舒侠作为学生代表，随胡巡官去了公安局，到公安局后，胡巡官说：要到县政府。这时，学生代表也豁上了，不管那儿都决心一去。走进了县政府，穿过大堂，从二堂再往后走时，警察们下手了，学生代表邓晨曦、刘舒侠被捕了。

邓晨曦、刘舒侠被捕后，六师的学生斗争并没有被压下去，相反，如火中浇油，斗争越来越激烈，解兆元、何培俊、朱剑白、李希林、苏玉涵、高文凯、王洪旭、赵源等，一方面继续坚持斗争，一方面对被捕的邓晨曦、刘舒侠寄予极大关心。他们轮流到看守所探视或送去饭菜，并抓紧时间与公安局交涉，要求放人。县政府在采取高压手段之后，见仍不能奏效，遂下令公安局放人。邓晨曦、刘舒侠被拘月余，最后宣布无罪释放。获释后，他们照常进行斗争，直至迎来新校长吴仁英，斗争告一段落。

吴仁英精明能干，处理问题圆滑，很会逢场作戏。他出任校长不久，宣布开除邓晨曦、刘舒侠，其目的是告诫学生，不安分守己学校是要给处分的，以此来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不料这么作的结果学生闹得更凶了，不仅在临汾闹，而且去太原闹，又是找吴仁英，又是找教育厅。最后，学校不得不收回成命，给了个留校察看以观后效的处分，学藩算是保住了。但却被当成共产党嫌疑，连国民党省党部都引起了注意，抓捕名单上也有了他们的名字。吴仁英校长暗中给邓晨曦、刘舒侠送信，要他们暂时躲起来，并通过一番周折，才从抓捕名单上将这些学生的名字勾掉。

一九三四年初，省教育厅转发了国民党中央教育部通知，规定从年暑期开始，各中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实行全县会考。会考是国民党推行法西斯教育的一个重要步骤，其目的是把学生引导到埋头读书，不问政治的轨道，从而达到限制青年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和抗日爱国运动的目的。

邓晨曦、刘舒侠等向学校提出请求，希望能免于参加会考，学校没有答应免试。在此情况下，他们又酝酿起了反会考斗争。考试那天，临汾城内的大战楼上集中了全部应届毕业生，考官们一个个摇头晃脑，神气活现，他们满以为，这一下把学生闹住了，不料考试一完结，学生们交上去的都是白卷，考官们气急败坏，扫兴而去。

临汾六师、临汾六中、临汾六女师等学校的青年学生，在“九、一八”前后，有不少人投入了抗日爱国运动，临汾也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一九八六年六月四日



回忆抗战前夕临汾的一次学生运动

临汾中学学生驱逐反动校长杨恩溥纪实

朱 鸣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抗日的热浪日益高涨，临汾中学的爱国学生，血气方刚，纷纷走出校门奋起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但却遭到校长杨恩溥（注）的反对和阻挠，激起学生们的愤慨。于是，群起而攻之，点燃了驱逐反动校长的怒火，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

山西省第六中学，设在临汾，这时已改名为临汾中学。校址在城内鼓楼西街小鼓楼巷内（即今天临汾一中所在地）。当时学生有初中六个班（41班至46班，每年级两个班），还有一个中学予科性质的补习班，共约三、四百人。我当时只有十三岁，这年秋季刚刚考入初中。以前在小学时代，虽曾经过“九·一八”、“一·二八”、“双十二”等事件，但没有亲身接触过政治斗争，因此，对于驱逐校长的斗争，印象虽很深刻，认识却较肤浅，这里只能作一点简短的回忆。

时间约是三七年十月上旬或中旬，早晨，我骑自行车到学校，只见校门口站着几个同学，个个手持童子军军棍，雄赳赳，气昂昂地把守着校门。他们盘问我，干什么去了？我说是从家中来上学。他们说，昨晚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住校？我说，因为我大病初愈，一直住在家里，没有住校。他们说快进去吧！这

时我十分诧异，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看见校内的情况，心中有些异样的神秘的感觉，到宿舍后，同学们告诉我，昨天半夜，同学们把校长住的院子（在校内东北角的一所小院）团团包围，去抓杨校长。我问，抓住了没有？同学们说，因事不机密，被两个内奸通风报信，叫老奸巨滑的杨恩溥事先逃跑了！同学们扑了个空，没有抓住校长，就在他的住处，仔细搜索了一番，把他的衣服被褥，家俱什物扔了满院。现在他家的大门已被贴上封条查封了，正在到处追缉这个家伙哩！

打校长的当天上午，同学们即纷纷外出宣传，到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概述校长在国难当头，不准学生宣传抗日救亡，只许埋头读书，并且历年来向学生征收苛捐杂费的种种罪恶勾当。当时每斤面只用五、六分钱，一袋机器面粉四十斤，也不过两元左右。而校长每学期向每个学生征收学费、杂费竟达三十元，补习班的学生，更要加收补习费五、六元，共达近四十元之多。这样就连一些中产家庭的学生也要因交不起高额的费用而被拒之于校门之外，失掉求学的机会，而校长每学期从学生中攫取一万多元巨款，除少数开支外，其余大部卷入私囊，大发横财（省立学校，经费全由省款拨付，所谓学费、实则开支无几。）

这期间，学校的教师们除少数进步的支持学生外，大部分由于迷失方向不知所措而出走了。一些不学无术，平日教学无方的教师，感到兔死狐悲，自身危殆，更是逃之夭夭了。而同学们得以自由呼吸新鲜空气，每日加紧了四出宣传抗日活动，因而激发了社会上许多爱国的志士仁人的抗日热情，盛赞学生们的爱国正义行动。当然也有一些不关心国家大事，而置身物外的顽固老朽们，暗地里指责学生们是“闹学潮，瞎胡来！”但他们也不过是向隅而泣，独自哀叹罢了。

给校长通风报信的两个学生，大家都愤怒指斥他们是“卖狗”、“汉奸”，是“甘心当亡国奴的民族败类”，所以一个叫

陈×的吓得屁滚尿流，夹起尾巴逃跑了。另一个靳××被同学们拉到学校大礼堂，进行批判斗争。靳××在会上浑身哆嗦，语无伦次，诚惶诚恐地向大家认罪，保证改过自新，愿和同学们站在一起，抗日救国。因此同学们对他予以谅解，没有再加深究。

记得十月中旬的一天，同学们整队上街游行示威，一路发传单，贴标语，演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唤起群众奋起抗日。游行的行列，威风凛凛，热气腾腾，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阻止学生抗日救亡的汉奸校长杨恩溥”等口号，唱着“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的歌曲，所到之处，群众夹道欢迎，奔走相告，人人扬眉吐气，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威风！同学们从西街走到东关，返回时路经第六师范学校（东大街文庙旧址，当时已改为初级染织科职业学校），这时，大院里已拥满了沸腾的人群，原来是女作家丁玲同志，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从陕北东渡黄河，由蒲县来到临汾城，住在东关车马店内。这时她正站在大成殿前的平台上，向青年发表演说。她在演说中号召青年学生们不能只顾埋头读书，而要关心国家大事，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时刻准备着到前线去，保卫国土，消灭日寇……。她的讲演，使同学们精神大振，益发增加了我们的斗争勇气。

这期间，学校基本上处于停课状态，领导这一运动的是三年级同学施晋和等人（我当时年幼，不知道是否共产党员，是否四〇年六月以后在临汾河东任临汾河东县委书记的石金河同志），后来，决定复课，一边学习，一边宣传，于是发出《告临中全体教师书》，呼吁全校教师们迅速返校，与同学们共同闹革命。不久，老师们纷纷回来了，学校也复了课。由学校的训育主任范锡山暂代校长职务。同学们选派代表与他交涉、谈判。他答应准许学生们进行抗日宣传的爱国运动，并答应退还多收学生们的苛捐

杂税。

临汾中学的这次学生运动先后持续了一个月左右。最后斗争胜利了。这个胜利对临汾全县人民，对晋南广大人民抗日救亡的信心，是一个有力的鼓舞。

注：杨恩溥、字渊若，山西襄陵人。当时年约四十余岁，身躯欣长，整天油头粉面，西装革履，出入大摇大摆，一付洋奴派头。其本家哥哥杨澄源，当时任陆军第六十九师师长兼晋南警备司令，司令部驻在六中西邻，与学校仅一墙之隔（今临汾地委大院全部）。杨恩溥与其兄过从甚密，其反动成性，久为学生不满，但如稍有反抗言论，杨即仗其兄之势力，予以镇压。三七年十月初（或九月下旬），六十九师合并到三十四军，杨澄源升任军长，并奉命开拔太原，保卫阎锡山，美其名曰：“北上抗日”。曾在城内商会巷戏台大院召开全城民众代表欢送三十四军“北上抗日”大会。杨率部开走，同学们解除了后顾之忧，所以，在这时发动学生运动，以免遭到反动军人的镇压。

（市委党史办 供稿）



抗日战争时期临汾河东政治

形势概述

赵世元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日军侵占临汾县城并控制同蒲铁路沿线后，将临汾全县分割为河西（原二、五区）河东（原三、四区）两块地方，而县城及近郊（原一区）则为日军占领区。因作者长期在河东片工作与生活，就记忆所及，现将抗日时期临汾河东的政治形势概述如下：

一、日军占领临汾初期河东区的形势（一九三八年二月至一九四零年二月）

1、临汾河东地理形势和抗日政府的建立

在临汾河东，南从大苏经县底镇往北至王雅村一线以西地区为平原，土地平坦，交通便利；此线往东逐渐由丘陵向山地发展，卧虎山、土从山、壶口山雄踞东南，漫天岭山脉南自壶口山向北一直延伸到王村北边的汧河旁。再往北又有西佐岭与佐村岭在汧、涝两水之间连绵相接。这一带沟壑纵横，形成临汾以东的自然屏障，也是太岳区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的前沿阵地。

日军侵占临汾县城后，临汾县抗日政府在县长李从文带领下撤往河西枕头垣。为了便于领导河东军民抗战，一九三八年三月底临汾县政府河东办事处在许村成立，仍依原山西省临汾县的行政区划辖三、四两区。三区（大阳镇）区长为景仙洲，四区（东亢镇）区长为宋维藩（移住南桥村）。区以下行政单位为编村（阎锡山一九三六年实行新村制，将原来的自然村合并数个称为

编村)，编村公所脱产人员有村长1人，文书2人，村警2~4人。后又相继增设编村脱产人员农救会秘书、自卫队长及政治工作员各1人，其他各抗日群众团体如牺盟会、青救会、妇救会、教救会的负责人（秘书）均不脱产。

三区辖郭行（村长徐作槐）、上阳、王雅、大阳、乔李、北王、北麻等编村；四区辖贺家庄（村长亢松山为后吕鹤亭）、许村（村长李钟秀）、翟村（村长樊增涛）、大苏（村长张毓成）、南席（村长王学谦）、县底（村长孙振基后为马崇信）、贾得（村长吕鹤亭）东亢（村长赵源）、上官、小贾、封侯（村长韩兆祥）、神刘等编村。

2、临汾沦陷后的军事态势

日军占领临汾城后，主要是控制铁路沿线并向南展开攻势，一直进攻到风陵渡。这一时期，除点线外，铁路以东从山上往下，除我抗日根据地外，皆为我之游击区。浮山岭东的山交村成为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西部的中心，八路军总部、戎子和等同志领导的山西新军决死第三纵队司令部及山西第五专员公署都曾在这儿驻扎过，临汾河东各村民工曾往来运送粮草。

当时东边的安泽、浮山一带还驻有国民党友军高桂滋的二十七军和刘戡的八十三师（后扩充为九十三军）。

一九三八年上半年临浮两县边界之燕村、口子里一带驻有八十三师一部，苏寨、贺家庄驻有决死三纵队。临汾三区区区长景仙洲建立了临汾人民地方武装第四中队。这几支部队经常下到临汾城边打游击，少数日伪军轻易不敢出来骚扰，因此群众抗日斗争热情很高，河东各区革命工作能够顺利开展。

一九三八年夏初，决死一纵队二总队向同蒲铁路洪洞南北一线出击，一度打进甘亭车站和临汾车站，烧毁日军炮楼，歼敌三十余名。同年秋，景仙洲的四中队曾在老母一带截击沿临浮公路东进的日军数百人，毙杀多人。决死三纵队游击十一团在柏壁、